

英美大战略及两国关系研究

(1940~1949)

杨永锋 著



科学出版社

卷之三

卷之三



英美大战略及两国关系研究

(1940~1949)

杨永峰著

西北民族大学重点学术著作资助项目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20世纪40年代是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大变动和大调整时期，也是英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两国不仅建立了“特殊”的同盟关系，也完成了世界霸权的和平转移。本书介绍了在这一历史时期，为了应对急剧变幻的国际环境和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英美两国决策层之间的博弈、对抗与妥协。就英国而言，在消除了德国法西斯的威胁之后，维护帝国完整和保持英国全球大国地位就成为其主要战略目标；就美国而言，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契机，重塑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夺取世界霸权是其最高国家战略目标。英美两国决策层为实现各自国家战略目标樽俎折冲，两国关系也呈现出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大战略理论为研究这一时期的英美关系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视角。

本书适合世界史、国际关系及相关专业的研究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美大战略及两国关系研究（1940~1949）/杨永锋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

ISBN 978-7-03-055432-1

I. ①英… II. ①杨… III. ①国家战略—研究—英国—1940-1949 ②国家战略—研究—美国—1940-1949 ③英美关系—研究—1940-1949 IV. ①D756.1
②D771.2③D856.12④D87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9226 号

责任编辑：刘英红 / 责任校对：贾伟娟

责任印制：吴兆东 / 封面设计：华路天然工作室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3/4

字数 330 000

定价：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20世纪40年代是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大变动和大调整时期，先是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接踵而至的则是冷战的兴起，这十年可谓风云急剧变幻。战争催生了新的国际秩序和新的国际格局，也意味着大国之间将以实力为基础重新洗牌和定座次，其重要结果之一便是英美霸权的和平转移及两国“特殊关系”的形成。这两个事件都是20世纪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二战后兴起的大战略理论为研究这一时期英美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20世纪40年代的英美关系，国外学者研究较多，成果颇丰，他们从不同视角对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进行了阐释，具体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文化和情感认同方面来解读英美关系。此类研究成果有一部分出自英美决策层之手。他们强调情感和文化因素对20世纪40年代英美关系的影响——“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美特殊关系是兄弟般的讲英语的人们长期拥有共同的文化、语言和习俗积淀的结果”^①。其中，二战期间，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其所著的四卷本《英语民族史》中就持此观点，该书在考察了全世界“英语民族”形成过程及特殊地位后指出：相同的语言、相似的文化及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的情谊使“大西洋两岸和英联邦各成员国中的人们普遍感到兄弟般的温暖”。丘吉尔认为：二战后面临苏联崛起这一新的国际形势时，必须从整体上来考虑整个“英语民族……如形势有利，英语民族可以伸手指出正确的道路；若形势不利，只要我们有力量，当然也能保卫自己”^②。美国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

^① Baylis J.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39: The Enduring Allia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8-9.

^② 中译本见〔英〕温斯顿·丘吉尔著，薛力敏，等译：《英语民族史：不列颠的诞生（第一卷）》，海口：南方出版社，2004年，前言第4-5页。其余三卷为《英语民族史：新世界（第二卷）》《英语民族史：革命的时代（第三卷）》《英语民族史：伟大的民主（第四卷）》。

在《权力的纪律：现代世界结构的本质要素》一书中，对文化和情感在英美关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做了精辟论述：“英国和美国有着非常相似的世界观，我们的制度源自相同的本能和传统，我们分享同样的法律和习俗遗产，（我们的）哲学和实用主义世界观起源于同一知识传统。”^①

英国另一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也强调文化在英美外交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关系来比喻20世纪后半期的英美关系。古希腊拥有悠久、灿烂的文化，古罗马拥有强大的实力。麦克米伦以此为喻，其真实用意是试图在英美关系中用英国丰富、老练的外交经验和曾经领导世界的政治智慧去指导和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实现英国的战略意图。^②英国决策层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强调共同的文化和情感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二战后，英国国力下降，内外交困，迫切需要美国的友谊和援助，故英国决策者大打“情感牌”，试图唤起美国决策者和民众对英国的同情和支持。这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中，强烈呼吁“兄弟般的英美民族”携起手来共同应对“铁幕”另一边的苏联即可看出。

对于过分强调文化和情感因素在英美关系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一些学者并不认同。例如，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其所著的《血、阶级和怀旧：英美的讽刺》一书中，对麦克米伦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希钦斯认为：英国和罗马拥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而非与希腊，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国犹如晚期的罗马帝国，而美国则像早期的罗马帝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英美关系中，英国仅在某些方面扮演了“导师”和“领导者”的角色，但很快就被成熟的美国所取代；20世纪，英国在世界秩序的塑造上并没有起到突出作用，相反的是“美国的犁为他们在20世纪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英美关系中，英国的建议对美外交所起作用甚小，只有当两国利益或看法一致时，美国才与英国保持相同的外交政策。^③

与希钦斯不同的是，其他一些学者也强调文化和情感认同对英美关系发展所起的特殊作用，代表性人物有H.C.阿伦和里奇·奥文达尔等。其中，H.C.阿伦在其著述的《英美困境：英联邦、美国和欧洲统一》^④和《英国与美国：英美关系史（1783—1952）》^⑤中强调，英美特殊关系的形成，主要在于两国拥有共同的文化和语言，以及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里奇·奥文达尔在其撰写的《20世纪英美关

^① Ball G. *The Discipline of Power: Essentials of a Modern World Structure*. London: The Bodley Head, 1968, p. 91.

^② Dobson A P.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f Friendship, Conflict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Superpowers*.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 164-165.

^③ Hitchens C. *Blood, Class and Nostalgia: Anglo-American Iron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④ Allen H C. *The Anglo-American Predicament: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t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60.

^⑤ Allen H C.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y of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783-1952*. London: Odhams, 1955.

系史》一书中也指出：英美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制度，这造就了它们之间的特殊关系，但这种特殊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①

客观地说，文化认同在英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绝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纵观英美关系史，国家利益及实力的此消彼长才是决定两国关系的根本因素。

从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视角考察两国关系。研究大国关系，历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英国和美国作为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世界霸主，它们之间的关系及两国霸权的和平转移更是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其中，卡梅伦·瓦特撰写的《接替约翰牛：美国取代英国（1900—1975）》一书是研究英美霸权转移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考察了 1900~1975 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历史过程。瓦特认为：美国成为世界强国是以英国力量迅速下降为前提的，而英国力量的下降则导致了帝国的解体。^②彼特·克拉克在《英帝国最后一千天：丘吉尔、罗斯福和美国统治下和平的诞生》一书中，详细考察了从 1944 年 9 月~1947 年 8 月，英美两国决策者在两国内政、双边关系和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决策过程，以及英国在经历二战后，由盛到衰，其世界霸权地位最终被美国所取代。^③

此外，一些学者则从经济霸权转移的角度来考察英美关系。如艾伦·多布森、理查德·加德纳、理查德·克拉克和兰达尔·班尼特·伍兹等。^④其中，加德纳和伍兹的研究更具代表性，加德纳在《英镑——美元外交：英美在重建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合作》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英美两国在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中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其过程充满了分歧和争论，但两国在经过折中和妥协后最终达成了一致。^⑤伍兹撰写的《换岗：英美关系（1941—1946）》一书，利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详细阐述了 1941~1946 年，英美两国经济关系，以及美国如何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利用英国经济陷入困境之机迫使其不断让步，直至

^① Ovendale 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

^② Watt C. *Succeeding John Bull: America in Britain's Place, 1900-1975: A Study of 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hip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Context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Foreign-Policy-Mak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③ Clarke P. *The Last Thousand Day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hurchill, Roosevelt and the Birth of the Pax Americana*.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08.

^④ Dobson A P. *The Politics of the Anglo-American Economic Special Relationship, 1940-1987*.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Dobson A P. *US Wartime Aid to Britain: 1940-1946*.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86. Clarke RWBS, Cairncross A S. *Anglo-American Economic Collaboration In War and Peace, 1942-194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⑤ Gardner R N, Ellis. *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Anglo-American Collaboration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ultilateral Tra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最终建立美国经济霸权的过程。^①

其实，经济衰落是英国霸权最终衰落的主要原因。英国经济实力的下降导致其在帝国防御方面的能力严重不足，在二战爆发后尤为突出，这就迫使英国不得不向美国求援，而美国的援助使英国在经济方面严重依赖于美国，也为美国向其施压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提供了契机。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英美在重塑战后世界经济秩序方面进行的激烈斗争就是明证。

考察英美同盟及特殊关系的建立。二战期间及战后，英美不仅结盟，更建立了特殊关系，对此，学者有很多论述。其中，约翰·贝利斯的《英美防务关系（1939—1984）：特殊关系》一书，主要论述了1939～1984年英美两国在防务方面的合作情况。贝利斯认为：英美特殊关系体现在诸多方面，但防卫关系是两国诸多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是特殊关系的核心内容。^②在《1939年以来的英美关系：持久的联盟》一书中，贝利斯整理了自1939年二战爆发至1991年冷战结束这段时期内，英美决策层对发展两国关系做出的一系列分析、评估和展望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并非简单的堆积，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取舍，以突出“分歧与合作共存”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美英关系的主要特点，即“美英之间确实存在着特殊关系，但在很多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如在远东和中东地区，美英就一直矛盾重重，其中对美英特殊关系冲击最大、伤害最严重的则是痛苦而又难忘的苏伊士运河危机”^③。

除贝利斯的著述外，艾伦·多布森著述的《20世纪英美关系：友谊、冲突和超级大国的兴衰》一书也是研究英美关系的重要著作。多布森在考察了整个20世纪英美关系发展历程后指出：在长达一个世纪的英美关系中，两国之间既紧密合作又有严重分歧，即使在合作蜜月期，美国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也保持着一定距离；冷战期间，美国虽然承认英国是其坚定而强有力的盟友，但也爆发了严重影响两国关系的苏伊士运河危机。^④莱斯利·霍华德·盖尔布在《英美关系（1945—1949）：走向一种联盟理论》一书中，用国际关系中的联盟理论对1945～1949年的英美关系做了阐释。在该书中，盖尔布将理论与史事结合起来，论述了二战后英美结盟过程及原因，其中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相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

^① Woods R B. *A Changing of the Guar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1-194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② Baylis J. *Anglo-American Defence Relations, 1939-1984: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4.

^③ Baylis J.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39: The Enduring Allia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④ Dobson A P.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f Friendship, Conflict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Superpowers*. London: Routledge, 1995.

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是英美再次结盟的主要原因。^①

斯蒂夫·维斯在《冲突中的盟友：英美战略谈判（1938—1944）》一书中，论述了1938～1944年英美为应对德国威胁而结盟，但由于两国战略指导原则的差异及相互信任的缺失，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1944年以前，丘吉尔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影响较大，也决定了英国的意见在两国联盟中占据了上风，1944年以后，情况正好相反。^②马克·柯蒂斯在《大骗局：英美权力和世界秩序》一书中，探讨了二战结束后，英美两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英美“特殊关系”的形成、冷战结束后英美两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及它们在中东和联合国实施的外交政策。最后作者提出：英美为了维持目前的世界秩序，在三个领域推行的外交政策尤为重要，即优先重视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合作；在中东，美国想维持现状，而英国在海湾地区扮演着关键角色；英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联合国安理会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功能。^③

除上述著作外，美国学者罗伯特·哈撒韦的《模糊的盟友：英国和美国（1944—1947）》一书也值得关注。在该书中，哈撒韦详细论述了1944～1947年英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在处理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关系。^④

通过研究英美最高决策者来考察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国家最高决策者在一国对外战略制定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作为战时举足轻重的两大巨头——罗斯福和丘吉尔，他们之间的关系、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及对战后世界的看法，不仅对英美两国关系，也对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学者通过研究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战时关系及他们二人的战略观来分析英美两国关系。例如，凯思·塞恩斯伯里在《战时丘吉尔和罗斯福：他们所进行的战争及他们所希望缔造的和平》一书中指出：二战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建立战后世界秩序上的看法几乎截然相反——罗斯福希望建立一个以大国合作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而丘吉尔正好相反，他希望恢复世界旧秩序——在欧洲，通过扶助法国、改造德国来恢复欧洲旧秩序，但鉴于战后苏联实力大增，英国必须与美国结盟以恢复欧洲均势；在非洲、中东和亚洲，丘吉尔力主恢复战前状态，即恢复大英帝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建立的殖民体系。正因为二人在建立战后世界秩序上的立场迥异，他们在制定战时军事大战略、对苏政策、波兰和东欧问题、对戴高乐和法国

^① Gelb L H.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49: Toward A Theory of Alliance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8.

^② Weiss S. *Allies in Conflict: Anglo-American Strategic Negotiations, 1938-1944*.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6.

^③ Curtis M. *The Great Deception: Anglo-American Power and World Order*.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④ Hathaway R M. *Ambiguous Partnership: Britain and America, 1944-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的态度、处置战败的德国问题，以及中国和远东问题上均产生了严重分歧。从整体来看，从1941年年底到1943年中期，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关系的全盛期，期间，两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尤其是在军事战略问题上，英国立场占据了上风；但从1943年中期开始直到罗斯福去世，随着美国对战争的贡献越来越大，以及罗斯福为了拉拢苏联，以实现其战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意图，开始有意疏远丘吉尔，导致二人关系逐渐恶化。^①

戴卫·雷诺兹在其著述的《从世界战争到冷战——丘吉尔、罗斯福和20世纪40年代国际关系史》一书中提出：要了解英美特殊关系，就必须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兴起的年代，正因为二战和冷战才构筑了英美同盟，两国特殊关系也由此建立。此外，该书还论述了英美同盟的建立，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战时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二战结束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破裂、冷战的兴起及英美特殊关系的建立过程。^②西奥多·威尔森的《第一次高峰会议：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普拉森夏湾（1941）》是研究战时罗斯福和丘吉尔首次会晤的一部重要力作，该书几乎全景式地展示了大西洋会议的召开情况，重点论述和分析了英美两国决策层围绕《大西洋宪章》的起草而展开的争论和采取的折中。^③

此外，还有两本研究战时英美首脑外交和两国关系的重要著作：《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和《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他们发起的战争及他们寻求的和平》。这两本书详细考察了英美苏三国在二战期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它们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结盟，但三国在国家利益、军事战略及在国家战略上所产生的严重分歧最终导致大同盟的破裂。这两本书不仅是研究20世纪40年代英美关系，也是研究战时三国首脑外交的重要著作。^④

上述著作通过研究二战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的首脑外交来探讨英美两国关系，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战略思想及他们所推行的外交政策来分析英美关系。其中，研究丘吉尔战略思想的著作有《丘吉尔和战争政治：1940—1941》《丘吉尔的冷战：个人政治外交》《英国大战略的基础和制定：1940—1943》《以联盟维持权势：英美大战略比较》等。这几部著作主要从英

^① Sainsbury K.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at War: The War They Fought and the Peace They Hoped to Mak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

^② Reynolds D.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Churchill, Roosevelt and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194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③ Wilson T A. *The First Summit: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at Placentia Bay, 1941*.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④ [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叶佐译：《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Feis H.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国战时外交、战略决策和联盟角度，论述了二战期间丘吉尔的决策动机及对英美两国关系的影响。^①

研究罗斯福战略思想和战时外交政策的重要著作有戴卫·伍尔纳等的《罗斯福的世界：战争、和平和遗产》。伍尔纳等认为：罗斯福拥有既不同于丘吉尔的“大英帝国观”，也不同于斯大林的“欧亚地区观”，而是一种“世界观”或“全球观”。罗斯福的战略观导致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丘吉尔发生了尖锐冲突。^②罗伯特·舍伍德的《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③和罗伯特·达莱克的《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也是研究二战时期罗斯福对英国外交政策及英美关系的力作。其中，《罗斯福与霍普金斯》是一本“全面的、半官方的论述战时（英美）外交关系的重要著作”^④。《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重点论述了罗斯福在任美国总统期间所推行的一系列外交政策，该书第三、第四部分大量涉及了战时英美关系，作者认为：罗斯福“既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⑤。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或日记，这也是研究这一时期英美关系的重要原始资料。其中，丘吉尔在1948~1954年，相继出版了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⑥，可以说，该书是对二战全景式地展示。丘吉尔的特殊地位使其在撰写这部巨著时可以不受阻碍地查阅英国官方档案，因此该书收录了大量的政府文件、会议记录及各种来往函电，从而使该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也成为研究战时英国外交政策和英美关系的重要著作。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统，但因病突然殉职，未留下自己的回忆录，而继任总统杜鲁门在离职后则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⑦。杜鲁门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处于大调整期，当然也包括对英美关系的重新调整和定位，故其回忆录也是研究20世纪40年代英美关系的重要资料。除英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出版的回忆录之外，众多参与或见证了该时期内最高决策的当事人在离职后也相继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或日记，如美国几任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迪安·艾奇逊、詹姆斯·

^① Lawlor S. *Churchill and the Politics of War, 1940-19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Larres K. *Churchill's Cold War: The Politics of Personal Diplom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Farrell B P. *The Basis and Making of British Grand Strategy, 1940-1943: Was There a Plan?*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8. Sampanis M. *Preserving Power through Coalitions: Comparing the Grand Strategy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② Woolner D, Kimball W, Reynolds D. *FDR's World: War, Peace and Legacie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8.

^③ [美]罗伯特·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④ Woolner D, Kimball W, Reynolds D. *FDR's World: War, Peace and Legacie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8, pp. 8-9.

^⑤ [美]罗伯特·达莱克，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⑥ 中译本见[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韦凡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全书共六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

^⑦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

斯·贝尔纳斯和爱德华·斯退汀纽斯，白宫参谋长威廉·李海、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等。^①

这些当事人身处要位，是许多重大决策的参与者，他们的决策对这一时期英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的回忆录或日记中引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事后他们在对一些重大决策的看法上却见仁见智，甚至截然相反。正如兰克所说：“有些人意在攻击或辩护，有些人只是希望记载事实。”

就国内学术界而言，关于 20 世纪 40 年代英美关系的研究依然是一个有待深入发掘的领域。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这一时期英美关系的系统性著述依然非常少见，仅在一些出版的战后国际关系史或国别史的著述中有所涉及，但囿于主题和篇幅，对 20 世纪 40 年代英美关系的论述均是点到为止。近年来，国内出版了几本与战后英美关系相关的著作，其中有薛谋洪的《英美特殊关系与英国对华政策》^②和杨冬燕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英美关系》^③，前者主要考察了 1949～1954 年，英美“特殊关系”及美国因素给英国对华决策所带来的影响；后者主要论述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英美“特殊关系”的冲击。

除此，还有张颖的《从“特殊关系”走向自然关系——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对英国政策研究》^④，该书在考察了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对英国的外交政策后提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英美之间依然维持着“特殊关系”，但到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由于诸多事件的冲击，两国“特殊关系”已大为削弱，逐渐转变为“自然关系”。梁军的《不对称的特殊伙伴——联盟视野下的战后英美关系研究》^⑤一书，主要论述了英美联盟的建立、演进和发展过程。张振江的《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⑥一书，主要从经济霸权转移角度，论述了 1929 年经济大危机至 1945 年期间，英美为争夺世界经济霸权展开了激烈较量，最终美国利用二战之机从英国手中夺取了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纵览上述著作，均因主题关系，并非是真正研究 20 世纪 40 年代英美关系的专题著作。

^① Hull C.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48. Acheson D.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69; Byrne J. *Speaking Frankl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47; Leahy W. *I Was There*. New York: Whittlesey House, 1950; Stimson H L, McGeorge B.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48; Blum J.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Years of War, 1941-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9.

^② 薛谋洪：《英美特殊关系与英国对华政策》，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 年。

^③ 杨冬燕：《苏伊士运河危机与英美关系》，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④ 张颖：《从“特殊关系”走向自然关系——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对英国政策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

^⑤ 梁军：《不对称的特殊伙伴——联盟视野下的战后英美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

^⑥ 张振江：《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综上所述，尽管众多国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 20 世纪 40 年代英美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依然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研究这一时期英美关系的著作长于过程叙述而少理论分析，用大战略理论来解读两国关系的著作更是罕见。人们常说纲举目张，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幻的 20 世纪 40 年代，英美两国决策层为实现本国利益，制定的指导各自国家对外行动的大战略就是理顺和探析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纲”。

其次，对影响这一时期英美关系的第三方——苏联因素重视不够。学者在论述 20 世纪 40 年代英美关系时很少提及苏联因素，即便有所涉及，也惜墨如金。而苏联在战时及战后初期的决策和行为，不仅对当时英美两国的对外政策，也对两国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国外学者相比，纵观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除上述不足外，还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就史料引用而言，对第一手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利用非常欠缺；其二，在研究方法上，重宏观论述而少微观分析；其三，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战略思想研究不够，而深入理解他们的战略思想则是解开 20 世纪 40 年代上半期英美关系的一把钥匙。鉴于这些不足，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弥补。

第一，在对大战略理论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结合档案材料，详尽分析从 1940 年法国败亡到 1949 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建立这一时期内，英美两国决策层在战后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做出一系列战略决策的动机，制定本国大战略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和诉求。

第二，通过详尽的微观研究来展示这一时期英美两国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关系。很多学者在论述英美关系时，将 1939 年二战的爆发作为英美发展紧密关系和建立同盟的开端，实则不然。1940 年法国的败亡才是促使英美两国决策层决定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主因。英法盟军在西线惨败后，英国内阁在权衡利弊后，做出了与美国结盟，与德国打一场全面战争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决策不仅对英国，也对英美两国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罗斯福出于对美国安全的长远考虑，在对英国抵抗能力和战略价值进行了详细评估后，做出了大力援助英国的重要战略举措。因此，从利益互补上来说，战时英美关系只不过是一种“政治联姻”而已，这从 1943 年以后，罗斯福对丘吉尔的态度即可看出。

纵观二战末期罗斯福对英国的外交举措，可以看出：在罗斯福眼中，英国仅是出于战争需要而必须与之合作的战争盟友，而苏联既是战争盟友，又是建立战后世界新秩序不可缺少的战略伙伴。英苏对美国国家利益而言，孰轻孰重已不言而喻了。因此可以说，在二战期间，丘吉尔一直试图与美国建立某种“特殊关系”，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第三，本书在借鉴学术界已有的对丘吉尔和罗斯福战略思想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了他们的战略观，并运用大战略理论来评析他们依据各自的战略

观为本国制定的大战略的成败得失。就丘吉尔而言，其深受英国传统战略思想的影响，试图在战后通过扶助法国、改造德国、借助美国力量来恢复欧洲均势，进而维持大英帝国的完整和影响力；就罗斯福而言，深受威尔逊思想影响，致使其非常厌恶均势和势力范围，故不遗余力试图建立以大国协调和合作来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新秩序。丘吉尔的“帝国观”和罗斯福“世界观”的理念不同，是战时英美两国在军事战略和构建战后国际秩序上发生严重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战后欧洲和世界形势发展的预期结果来看，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只是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就英国而言，二战后，随着冷战的兴起及随后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建立，欧洲又恢复了均势，但不同的是，构建这次均势的“操盘手”是美国而非英国，英国只不过是美国构建欧洲均势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棋子而已；就美国而言，战后并没有实现英美苏中紧密合作共管世界的局面，而是回到了罗斯福深恶痛绝的均势状态，只不过这种均势不是传统的欧洲均势，而是美苏两极均势。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20世纪40年代是国际体系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面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英美两国决策层积极调整本国战略以应对。就英国而言，随着1940年法国的败亡，其面临的形势岌岌可危，临危受命的丘吉尔及其所领导的战时内阁在权衡利弊后，做出了依靠美国援助来打败德国法西斯的战略决策，这也意味着英国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交给了美国。但已执世界政治权力之牛耳近百年的大英帝国岂肯轻易俯身于他国，而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光荣与辉煌的丘吉尔，更是以维护帝国完整为己任。就美国而言，其经济实力早已首屈一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结束后，威尔逊就积极尝试建立美国霸权，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1939年二战的爆发，为美国再次攫取世界霸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二战初期，美国决策者就开始设计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蓝图。最终，具有全球视野的罗斯福为美国制定了取代英国问鼎世界霸权的大战略——“罗斯福蓝图”。英美大战略的冲突必将给两国战时关系带来纷争和矛盾。

二战后，经历战争摧残的英国，国内满目疮痍，经济步履维艰，国力江河日下，对外则要面对虎视眈眈的苏联。因此，无论是发展经济，恢复国力，“重温帝国梦”，还是应对苏联的威胁，都必须依靠美国的援助，因此英国决策层决定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并再次结盟。和英国相比，战后美国国力可谓如日中天，但并非万能。经过二战洗礼，苏联已崛起为世界一流强国，成为美国实现霸权的最大障碍。为了巩固美国霸权，杜鲁门政府制定了遏制大战略。要实现此战略，离不开盟友的帮助，环视宇内，英国则是不二人选。

纵观20世纪40年代英美两国的兴衰，可谓“兴也战争，衰也战争”。与战

争相伴随的英美两国关系则可用“安危与共、和斗相兼”来概括。总之，要探讨20世纪40年代英美关系就离不开对一“热”一“冷”两场战争的分析，而要探讨战争就必须先了解战略、认识战略和研究战略，因为战略是战争的灵魂，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军事战略指导下进行的，而军事战略只不过是一国内政和外交的延续而已，最终都要服务于国家大战略。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英美解密的档案资料为依据，借鉴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大战略理论、相关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研究等方法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

根据大战略理论，决策者只有在对本国当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做出客观、理性的评估后，制定出的大战略才具有现实意义；决策者在制定国家大战略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鉴于此，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层次分析法就为本书在分析英美两国决策者在制定各自国家大战略时的依据和动机提供了理论基础。肯尼思·华尔兹在其所著的《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引起战争爆发三个根本因素：人的本性和行为，国家内部结构问题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①华尔兹从人、国家和国际体系来分析战争爆发的原因与大战略理论要求决策者在制定大战略时，对本国国情、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决策者是否具有战略思维等这些影响大战略成败的因素进行周密分析和评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比较研究法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常见方法。领导人的治国能力和决策对一国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二战期间，作为世界上两大强国的最高领导人——罗斯福和丘吉尔，他们的执政理念和决策不仅对英美两国乃至对整个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他们的执政理念及做出的战略决策与他们的经历，本国的历史传统及当时两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从上述这些因素入手，比较研究罗斯福和丘吉尔战略观的异同也是理解战时英美两国大战略形成的一把钥匙。

杨永锋

2017年5月15日

^①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大战略理论及战时英美大战略	1
第一节 大战略理论	1
第二节 二战期间英国大战略	10
第三节 二战期间美国大战略	14
第二章 法国败亡与英美同盟的建立	19
第一节 并肩作战：“先欧后亚”大战略的确立	20
第二节 “最高尚法案”——《租借法案》的出台	32
第三节 为何而战——《大西洋宪章》的发表	40
第三章 英美军事战略大争论	52
第一节 英国战略占据上风（1941年1月～1943年8月）	52
第二节 美国战略的胜利（1943年9月～1944年6月）	68
第三节 苏联因素与英美战略之争	77
第四章 英美重建战后世界秩序之争论	91
第一节 传统与进步：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战略观比较	91
第二节 英美对建立世界政治秩序之争论	102
第三节 英美对建立世界经济秩序之争论	114
第五章 战后英美大战略	122
第一节 保持历史惯性：战后英国国家大战略	122
第二节 继承与调整：战后美国国家大战略	136

第三节 对英美大战略的评价和反思	147
第六章 战后初期矛盾重重的英美关系	156
第一节 租借总清算及英美财政贷款谈判	156
第二节 英美在原子能研究方面的合作与分歧	166
第三节 英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	178
第七章 英美再次结盟及原因分析	189
第一节 “遏制”苏联与英美再次结盟	189
第二节 英美结盟原因分析	201
结语	219
参考文献	227